

#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基于情绪调节理论的解释

作者：刘宇平 周冰涛 杨波

## 第一轮

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我们对文章的结构和内容做了较大的调整。在逐条回应审稿意见之前，我们希望先对本文及修改思路进行整体上的说明。最为重要的改动是接受了审稿专家 1（意见 2）的建议，删除了原研究 1，并对原研究 2 和文章整体思路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整个文章改动较大，我们将主要的改动内容和重要的观点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此外，自检报告也做出了相应的修改。

修改后的文章以暴力犯为被试，基于“情绪调节理论”（详见 1.1），探讨情绪是如何导致攻击行为的。本文延续了以往研究的做法（Chester & DeWall, 2017），从两个方面入手，验证了“情绪调节理论”的有效性：1.个体是否会出于改善情绪的目的而实施攻击（详见 1.2）？2.攻击行为是否真的能够改善情绪（详见 1.3）？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分别进行了讨论（详见 1.2 和 1.3），对攻击类型也进行了区分（详见 1.4）。为此，初稿中的研究 2 被拆分为了两个部分，新的研究 1 旨在回答问题 1，新的研究 2 则回答问题 2（详见 1.5）。具体的修改思路和说明及对审稿专家意见的回应如下：

###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以监狱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探讨暴力犯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研究选题具有很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科学问题的回答对现有研究领域推进具有贡献价值。然而目前论文还存在概念界定模糊、研究内在逻辑关系不清晰等问题，具体修改建议如下：

**意见 1：**研究一中涉及的概念和量表 基本是测查特质的，尤其是作者 也指出 虐待 冲动测查的是一种人格倾向，而用这种人格倾向作为内在动机（即情绪改善动机）的测度存在科学概念混淆的问题。人格与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但两者不能等同。此外，自变量特质愤怒是一种人格特质，中介变量虐待冲动也是一种人格特质，建构一个模型，用一种人格特质预测另外一种人格特质的变化，需要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但这些方面作者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如您所言，我们对这一部分的理论基础没能做出很清晰的解释。我们在修改稿中删除了原研究 1，不过我们还是想与审稿专家做一点思路上的交流和解释，以便您更好地了解此项研究。施虐冲动代表“情绪改善动机”的做法是有文献和理论依据的（Chester & DeWall, 2017），但在初稿中很遗憾没能详细论证清楚。特质愤怒和施虐都具有人格特质的属性，但二者的侧重却有不同：特质愤怒侧重情绪，施虐冲动侧重动机。这种用偏特质性的问卷测量其他心理过程的做法在以往研究中是有的。例如原研究 1 中用到的攻击问卷中许多条目都有明显的“特质”属性：“我是一个脾气平和的人”、“我比一般人更容易与人打架”等，但该问卷也确实被用于对攻击行为的测量（Buss & Perry, 1992; Chester et.al, 2019; Krizan & Johar, 2015; ）。不过很抱歉，我们在初稿中没能清楚地论证清楚这一问题，在今后的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会加强相关理论和依据的论述，再次感谢审稿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建议！

**意见 2：**两个研究设置的内在逻辑不在一个主线上，也不是逻辑关系的递进。结合本文要探讨的研究主题，建议只保留研究二，并进一步厘清研究二的逻辑和报告内容的层次性，以清

晰呈现对研究主题的回答。

**回应：**在您建议的基础上，我们出于以下考虑，删除了原研究 1，并基于原研究 2 对全文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布局。首先，原研究 2 的前半部分已经较好地说明了“个体是否会出于改善情绪的目的而实施攻击？”这一问题，原研究 1 显得有些多余。其次，原研究 1 中没有与原研究 2 的后半部分对应的内容，使整个研究的逻辑和结构都令人困惑。第三，如您在上一条建议中所述，本文涉及情绪、动机、行为等多层面的变量，只用问卷来说明这些问题虽然也有理论依据，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是无法否认和彻底避免的。综合以上考虑，我们接受了您的意见，删除了原研究 1。同时，我们将原研究 2 重组为新研究 1 和新研究 2，新研究 1 检验了情绪改善预期在情绪和攻击间的中介作用，回答“个体是否会出于改善情绪的目的而实施攻击”（详见修改稿“研究 1”）；新研究 2 考察攻击前后个体情绪的变化及攻击大小对攻击后情绪的预测作用，回答“攻击行为是否如个体预期的那样，能够改善情绪”（详见修改稿“研究 2”）。

**意见 3：**研究二只有 88 个被试，但作者却做了一系列统计分析，建议作者就 88 人被试量做所的分析给出统计检验敏感性报告。

**回应：**由于被试不易得，原研究 2 的样本量的确较少，这也是我们纳入原研究 1 的重要原因。不过，本文的样本量是符合心理学研究要求的。首先，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对样本量计算的内容及相关依据（详见 2.1.1 和 3.1.1）。之后，基于您的建议，我们又对统计检验敏感性进行了检验：首先是检验极端值的影响。仅有 1 个被试在前测负性情绪的得分超出了 3 个标准差，所有被试在其他变量的得分均在正负 3 个标准差之内。若剔除这一被试，主要结果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另外，即使采用更为严格的  $Q1-1.5IQR$  和  $Q3+1.5IQR$  ( $Q1, Q3$  分别为下、上四分位数， $IQR$  为四分位距  $Q3-Q1$ )，会有 8 名被试被剔除。剔除前后，由于样本量变小，显著性有所降低，但效果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Delta \eta^2$  不超过 0.01,  $\Delta \beta$  不超过 0.03)。上述结果共同表明本研究未受极端值的影响，结果稳定可靠。此外，本研究为 1 对 1 展开的，对缺失值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其稳定性也不受缺失值的影响。

**意见 4：**图 2 的结果应该是分别作了两个模型，请将正负情绪的结果分开放在两个模型中更清晰。

**回应：**我们对该模型进行了优化，检验中介效应时，分别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当作对方的控制变量，形成了一个新的综合模型（详见 2.2.3 和图 1）。结果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意见 5：**作者在研究局限性中指出，研究 1 的问卷研究仅关注了人格特质，而研究 2 的情境实验忽略了特质层面的变量。但其实本文的研究 2 被试来自于研究 1，而研究 1 中所有的被试都测查了相应的人格变量，所以建议作者完全可以在研究 2 的分析中，增加人格变量影响的分析，以增加研究结果的丰富性。

**回应：**原研究 1 和原研究 2 的数据的确来自同一监狱。但受监狱中管理制度等限制，原研究 2 的被试并不完全包含于原研究 1。重合的被试仅有不足 60 人。考虑到本就有限的样本量，我们很难把人格变量再纳入分析了。考虑到原研究 1 已经删除，修改稿中不足与展望的相关内容也在修改稿中删除了。

.....

**审稿人 2 意见：**

研究采用两个部分来探讨攻击对情绪改善的影响，区分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并且运用情境模拟实验检验了攻击的不同类型对情绪改善的作用。分别从情绪影

响攻击和攻击影响情绪的两个角度，探讨了情绪改善动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问题较有实际价值，研究方法可靠，提出了明确观点。但是在论文中还具有以下问题：

**意见 1：**题目不够清晰，论文从攻击对情绪的影响和情绪对攻击的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二者的关系，但是主题“攻击是改善情绪的手段吗？”强调了攻击对情绪的作用，似乎前后标题看起来并不一致，令人费解。

**回应：**原文的题目确实没有很好地概括全文的内容。我们对题目进行了修改，改为“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基于情绪调节理论的解释”。本文选取暴力犯为被试，从研究的初衷来说，我们关注的是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以减少攻击行为及其带来的危害。在修改稿中，我们以“情绪调节理论”为核心理论，旨在揭示情绪在攻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详见 1.1）。然而，要全面地厘清这一理论，不仅要关注情绪对攻击的影响，攻击对情绪实际造成的影响也是需要验证的，以往的一些研究也是这样做的(Chester & DeWall, 2017)。可以说，情绪对攻击的影响和攻击对情绪的影响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在论证“情绪调节理论”。在修改稿中，我们的论述围绕着“情绪调节理论”展开，并在题目中也进行了体现，以使本研究的主题更加突出和明确。

**意见 2：**研究 1 和研究 2 之间的实验逻辑存在矛盾，研究 1 探讨了情绪改善动机在情绪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以愤怒情绪和施虐人格作为负性情绪和情绪改善动机的指标有何依据，在问题提出部分并没有交代，需要明确这些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 2 则分为两个部分来探讨三者的关系，以情绪为自变量探讨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又以攻击作为自变量探讨对情绪的影响，但在实验设计部分没有明确进行阐述，因此实验逻辑存在混淆不清的情况。

**回应：**以愤怒情绪和施虐人格作为负性情绪和情绪改善动机的指标在初稿前言中有提到，同时也有一些文献的支持。如“Buss 和 Perry(1992)认为，愤怒是攻击行为组成的重要成分，并将愤怒作为攻击问卷(Aggression Questionnaire)的四个维度之一，代表攻击行为的情绪成分”。施虐冲动代表情绪改善动机的做法出自 Chester 和 DeWall (2017)的研究。不过，考虑到这种做法的确容易让人困扰，以及研究 1 与研究 2 前半部分论证的是同一问题，再结合另一位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选择删除了研究 1，并重新组织了研究 2，将其分为 2 个部分以使实验的逻辑更加清楚（详见 1.5）。

**意见 3：**研究问题的提出部分，探讨了情绪对攻击、攻击对情绪的影响，但是如何引出要探讨情绪动机改善的情况还不清楚，因此论文需要解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本文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让研究和实验的逻辑难以解释通顺。对于先前研究存在的矛盾之处也缺乏论证，究竟论文是倾向于解决情绪对攻击行为的促进作用，还是解决攻击行为对情绪改善的作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这一意见！原稿中，题目、前言、实验设计等部分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确使论文的核心观点不够清晰。我们在修改稿中做出了一些调整。首先，将“情绪调节理论”作为本文的核心理论（详见 1.1）以解释情绪是如何导致暴力犯攻击行为产生的。“情绪调节理论”认为会为了改善情绪而实施攻击，因此引出了对情绪改善动机的探讨（详见 1.2）。如回应 1 所述，论文的核心是基于“情绪调节理论”解释情绪是如何引发攻击行为的。对情绪影响攻击和攻击改善情绪的研究都是为了论述该核心问题（详见回应 1）。

**意见 4：**统计表格部分，格式和字体都不符合期刊要求，需要重新修改。描述统计和操作检验建议分开来写，对每个部分进行简要评述。图 2 情绪改变动机的中介效应路径图部分存

在数据和描述不一致的情况，建议与描述保持一致，“括号外为负性情绪作自变量的数值，括号外为正性情绪作自变量的数值。”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对格式进行了调整和修改。操作检验是基于差异性检验得出的，这两部分内容都不多，分开会显得有些零散。因此我们将两部分合并，并将标题改为“差异性检验与操作性检验”，并将这部分内容做了更为详细的评述（详见 2.2.1）。另外还增加了相关分析的结果（详见 2.2.2）。我们对原图 2 涉及的模型进行了改动和重新计算，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相互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其中介作用，以获得更准确的结果，详见 2.2.3 和图 1。

**意见 5：**讨论部分没有较好地展示研究结果，主要是基于情绪改善动机的中介作用进行讨论，而没有区分出不同情绪、不同攻击形式中介作用的差异，也没有谈及挑衅和非挑衅组别的调节作用，需要重新梳理这个部分的观点和内容。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对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着重对不同情绪、不同攻击形式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和讨论。具体来说，攻击类型对情绪调节动机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详见 2.3，4.1 第一段）；不同情绪的差异和不同攻击类型的差异（挑衅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研究 2，即攻击后个体情绪变化的部分。我们在讨论部分对这样的差异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主要见 3.3 和 4.2 以及 4.3 等部分）。

---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根据审稿意见对论文做了较为细致地修改，经过修改后的论文主题突出，逻辑连贯，建议接收。补充几点小的修改建议：

**意见 1：**正文中存在错别字，请认真校对，例如 3.1.1 被试，“组件变量”应为“组间变量”。

**回应：**已重新通读校对全文，对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进行了修改。

**意见 2：**建议在图 3 中标注显著水平。

**回应：**结合审稿专家 1 的意见，我们将 F 值，自由度，显著性等相关数据在 3.2.2 第一段中进行了补充。3.2.1 第 1 段也有相似的描述（详见红色字体）。

**审稿人 2 意见：**

根据第一稿的审稿意见，作者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改动，总体而言进一步理清了研究的层次和逻辑关系，较好地推进了情绪调节理论在暴力犯攻击行为中的研究价值和应用，更是明确了为何暴力犯不仅仅将攻击作为一种改善情绪的手段，而且也可能是获得积极情绪的一种调节方式。从而引出了主动性攻击和积极情绪在暴力犯攻击行为中的情绪调节作用，对于已有的研究结果和研究理论是一种推进和突破，因而具备较大的研究价值。在此次修改中，较好地修改了先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 题目从“攻击是改善情绪的手段吗暴力犯正负性情绪与攻击的相互影响”更改为“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基于情绪调节理论的解释”，更加明确了研究问题，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所欲研究的内容，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先前稿件中存在的问题。

2. 研究 1 和研究 2 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将原研究 2 重组为新研究 1 和新研究 2，新研究 1 检验了情绪改善预期在情绪和攻击间的中介作用，回答“个体是否会出于改善情绪的目的而实施攻击”（详见修改稿“研究 1”）；新研究 2 考察攻击前后个体情绪的变化及攻击大小对攻击后情绪



的预测作用，回答“攻击行为是否如个体预期的那样，能够改善情绪”（详见修改稿“研究 2”）。修改后研究的问题层次性更加清楚，研究问题也具有针对性。

3. 对于情绪变化的数据，收集数据大多是基于问卷测量得出，因而建议作者进行一定的操作检查，作者将差异性检验和操作性检验两部分合并，并将这部分内容做了更为详细的评述（详见 2.2.1）。另外还增加了相关分析的结果（详见 2.2.2）。

4. 同时对于中介模型进行了区分，对原图 2 涉及的模型进行了改动和重新计算，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相互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其中介作用，从而验证了负性情绪会使得个体产生情绪改善动机，从而引发攻击行为，但是这一中介作用在正性情绪中并不显著，从而区分了不同情绪下情绪改善动机对攻击行为影响的差异性。并且检验了挑衅和非挑衅组中两种模型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证明了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挑衅并不具备调节作用。改动后研究结果更加有力地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分析结果也更加清晰、可靠。

5. 对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着重对不同情绪、不同攻击形式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和讨论。具体来说，攻击类型对情绪调节动机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但是攻击行为对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较好地说明了正性情绪是攻击者产生攻击行为更为重要的动机和原因，但是在负性情绪条件下主动性攻击却可能带来更大的负性情绪，与正性情绪条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研究结果颇有启示，同时也对情绪调节理论在暴力犯攻击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较好的解释和应用，观点较为可靠、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回应：**十分感谢审稿专家 2 针对我们的修改进行的仔细阅读和逐条回应，并给与我们积极和肯定的评价。同时感谢审稿专家 2 对我们稿件提出的意见，使本文的结构和逻辑变得更加清晰。

---

### 第三轮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心理学报》慎重发表基于对暴力犯进行实验室模拟研究得出的下述结论：“反应性攻击既可以增加个体的正性情绪，又能减少其负性情绪；主动性攻击能使个体正性情绪增加，但却会增加攻击者的负性情绪。”其数据可能并非反映的这种因果关系，暴力犯自身的很多特质都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作者应明确限定其研究结论的范围，不能将基于暴力犯所做的研究，推广至其他人群，而不加任何限定。

**回应：**如审稿专家所言，暴力犯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其攻击行为及相关机制可能与正常人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在得出结论时应当加以限定而不能直接推广至其他人群。对此，我们对摘要和结论部分做出了限定，强调是在“暴力犯代表的高攻击人群中”，以确保结论的严谨性。事实上，本文的初衷之一便是利用暴力犯这一特殊群体探究这类特殊人群攻击行为的产生原因，而我们在摘要和结论这两个最重要的部分中都忽略了对这一问题的强调，一来造成了结论的不严谨，二来也导致研究的意义没有得到最好的体现，因此十分感谢审稿专家的这一意见。

**意见 2：**作者务必考虑如何避免出现下述情况：

1、“攻击他人，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正性情绪”，成为暴力犯攻击性行为的“借口”，为其“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提供所谓的科学依据；

2、“采取攻击行为，能增加自己的正性情绪”，进而导致攻击行为的扩大化和严重性。

作者有必要在摘要和讨论部分进一步加强“攻击作为情绪调节手段的非适应性”的内容，对如何避免出现上述两种状况提出具体有效的举措或解决问题的思路。事实上，虽然作者在文中

引用了他人的相关研究发现，但自身研究却并未直接涉及这方面内容。

**回应：**审稿专家针对本文可能造成的现实影响和误导提出了担忧，很值得作者思考并解决。审稿专家提出的两个问题其实是相似的，即可能给读者和公众造成一种误解：攻击能提升正性情绪，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提高正性情绪。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如下：

“攻击他人，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正性情绪”、“采取攻击行为，能增加自己的正性情绪”都是本研究发现的现象，也是本文的主要结论。我们希望通过描述这些现象更好地解释攻击产生的原因，并为减少攻击行为提供启示，而非发扬鼓励这种现象。文中的很多部分都在努力避免上述误解，并提出具体有效的举措或解决问题的思路。例如，4.3 部分说明了用攻击调节情绪的非适应性；4.4 部分指出了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减少攻击行为以及对“宣泄疗法”应谨慎使用等。另外，本研究同时强调了攻击对负性情绪的作用，也是为了说明用攻击调节情绪并非“明智之举”。

为进一步消除误解，我们在本次修改中又做出了如下调整：首先，增加了 4.3 中对“非适应性”的论述，并对 4.3 的标题进行了修改，以突出强调“非适应性”。在 4.3 的最后再次指出，我们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是为了减少攻击行为，而非鼓励这种做法，并借此引出 4.4 中的内容。其次，如意见 3 所言，我们将“改善”这样具有导向性的词替换为了“调节”这样的中性表述。最后，在摘要部分，我们也强调了要努力避免个体通过攻击调节情绪的做法以减少攻击的产生。

**意见 3：**在该文中慎将“攻击”与“改善情绪”对应，或许可考虑将暴力犯“改善情绪”这种偏正性的表达改为“调节情绪”这种相对中性的表达。

**回应：**的确，“改善”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将其改为“调节”这种中性表达也有助于解决意见 2 中提到的问题。

---

## 第四轮

**主编终审：**

请作者参考最后一位的意见作出相应的修改或回应，重点放在如何慎将“攻击”与“改善情绪”对应，避免给读者一个印象：可将“攻击”作为改善情绪的“助推”工具。研究方法、内容的本身问题可以作为研究局限在讨论部分加以讨论。

**回应：**针对两位审稿人，尤其是审稿人 2 的意见，我们对文章的方法、结果、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对研究方法、内容本身的问题进行了补充和讨论。对于最关键的避免结果误读误用问题，我们在摘要、结论中，调整了诸如“导致”这样表示因果关系的描述，而转用“伴随”这样的词；全文的“改善”也都替换为了“调节”。同时，明确地强调了用攻击调节情绪的危害以及我们应避免这样的危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实事求是描述研究结果的同时，也尽量避免了读者的误读和误用。具体的修改措施可见对审稿人 2 的回应。

**审稿人 3 意见：**

作者做了修改和调整，该文有所改进。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实事求是地报告研究发现，另一方面应避免研究发现可能被误读或误用。可否在《心理学报》上发表“无论是否受到挑衅，攻击行为都能使高攻击倾向个体获得正性情绪”和“受到挑衅后产生的攻击行为可以减少其负性情绪”的研究结论？

**回应：**我们对摘要、结论等关键部分进行了调整，以确保既实事求是地报告研究发现，又避

免研究发现被误读误用，详细的修改见对审稿专家 2 的回应。

#### 审稿人 4 意见：

该研究以改编的竞争反应时任务，考察了在押暴力犯的攻击行为以及攻击前正性负性情绪和攻击后正性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但是，该文提到的研究发现和结论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实验证据支持，存在表述上不够准确，可能会带来误读误用的风险。目前在如下方面可能尚需商榷，供参考：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原稿的摘要、讨论、结论等关键部分的确有表述不准确的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误解，在您的意见下，我们对摘要、被试描述、讨论、结论等部分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以解决这些问题，具体如下：

**意见 1：**整个研究基于 80 余名在押暴力犯，研究者将之作为典型的高攻击性个体，并以在这群对象上的研究发现推论到高攻击性个体的攻击行为与情绪调节。对此可能需要进一步讨论，如：研究所选择的重罪（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暴力犯，是否足够典型地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群中的高攻击倾向者？在 80 余名在监暴力犯身上得到的结论，其推广适用范围如何确定？

**回应：**关于被试的代表性问题。我们有如下的考虑和修改：首先，从客观行为上来看，本研究被试均为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的暴力犯，平均刑期达到了 19 年左右。从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看，他们无疑是典型的暴力攻击个体。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补充了被试在 PDQ-4 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维度的相关数据。详见 2.2.1 和 2.3。这一结果也能够证明这些被试是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再次，这些被试在攻击问卷的间接攻击和敌意维度的得分也高于常模。由于我们没有完整地测量攻击问卷，因此未在正文结果中呈现，但这也为被试的代表性提供了佐证。最后，我们考虑到“攻击”与“暴力”还是存在一定区别的，而我们是“暴力犯”为被试的，因此为了保证严谨，我们将“高攻击人群”改为了“暴力攻击人群”。

**意见 2：**目前的研究，展示了被研究的这一暴力犯群体在攻击行为和情绪调节方面的特征。若是能够结合对照群体（例如同样在监的非暴力犯）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具说服力。

**回应：**本文第一段和 1.5 部分交待了被试人群选择的目的是依据。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弥补以往研究大多在大学生和社区群体开展的不足，因此选取了高攻击性的人群进行验证和进一步探索。如审稿专家所言，补充一组被试的确能够更全面地说明问题，但非暴力犯与“攻击”这一主题的关联并不密切。例如财产犯、经济犯、职务犯等，其攻击行为并非其典型的特征，对于攻击行为机制这一研究目的的贡献很有限。加之在监狱开展研究受限较多，因此我们就没有做这样的对照，但总体上并没有影响本研究实现预想的研究目的。

**意见 3：**在研究中，实验操纵了挑衅和无挑衅两种条件，结果发现“无论是否受到挑衅，攻击行为都能使高攻击倾向个体获得正性情绪”。对于该结论，可能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例如，在研究中的这两个条件间，除了是否在是否受到挑衅上存在差异外，在第一轮游戏的胜负体验上也有差异。因此有关挑衅条件造成或不造成影响的相关结论，可能有必要结合第一轮游戏的胜负体验这一变量加以思考和讨论。

**回应：**本研究采用的范式为改编的竞争反应时任务，最主要的改编在于操纵的方式，以往多数研究是通过让被试写文章，然后操纵对文章的反馈来区分“挑衅”与“非挑衅”，即区别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本研究中，考虑到被试的文化水平，我们放弃了这种方式而选择了“简单任务失败范式”。正如审稿专家所言，严格来说，“胜负”可能也是一个变量，挑衅是不是影响相关结论的问题应当重新思考和讨论。

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思考和修改：事实上，“挑衅”并非我们关注的变量，而主动性攻击 VS 反应性攻击才是，我们沿用了(Chester, DeWall, & Enjaian, 2019)的方法，将 provocation 下的攻击视为反应性攻击，而 non-provocation 条件下的攻击视为主动性攻击。原稿中将其命名为“挑衅”和“非挑衅”确有不妥，一来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二来没有说清我们的研究目的。修改稿中，我们直接将这两组被试称为主动性攻击组和反应性攻击组，这样既能避免概念的混淆，又可以更直观地表达我们的研究目的。此外，在审稿专家的提醒下，我们在展望与不足部分增加了一些讨论，提出了“胜负”、“金钱物质”等可能与情绪有关的变量的讨论。

**意见 4：**研究一和研究二合并起来，研究者旨在考察暴力犯群体中负面情绪带来情绪调节动机，继而导致攻击行为，随后由攻击产生情绪调节效果这一连串的过程。在当前研究中，实际上整个过程是：被试自己报告了情绪，自己决定了攻击大小，然后又再次报告主观情绪。其中，被试的攻击前情绪、攻击行为都不是直接受到实验操纵的。所以，可能需要更多工作，来论证相互关联的各个因素（攻击前情绪、攻击强度和攻击后情绪）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因果关系。

**回应 4：**一方面，关于情绪的操纵。本研究的实验操纵部分主要是为了区别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在低负性情绪下产生的，而后者则是在负面情绪下产生的(Anderson & Bushman, 2002; Stanford et al., 2003)。在以往研究中，情绪会被当作操纵检验的指标或操纵检验指标的一部分(Chester & DeWall, 2017)。换言之，本研究正是通过操纵负面情绪实现了对攻击类型的区分。从结果来看，反应性攻击组比主动性攻击组产生了更强的负性情绪，也产生了更强的攻击行为。在修改稿中，我们仿照 Chester 和 DeWall 的做法，将攻击前负性情绪作为操纵检验的一部分，以强调出本研究对攻击前情绪的操纵。

另一方面，本文存在和该主题的其他研究相似的问题，没有对攻击行为进行操纵。这可能是因为行为学实验中，行为相对较难操纵，在监狱这样的敏感环境中更是如此。而且行为本身的选择也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部分。张丽华和苗丽(2019)的综述中也提到过在攻击与其他变量关联的研究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我们在不足与展望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讨论。

总的来说，刘国芳等（2018）在《作为因果关系的中介效应及其检验》一文中提到，因果关系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标准：共变性、时间顺序、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其中操纵主要是为了解决排除其他可能解释的问题。受范式和施测条件的限制，研究 2 没能通过操纵攻击行为实现严格的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但研究 2 尽可能地进行了弥补，不仅比较了攻击前后情绪的变化，还将攻击大小和情绪变化程度做了相关，这便是为了尽可能地排除其他因素（如情绪随时间消退）的解释，使因果关系能够更具有信服力。相比而言，心理学中大量存在的基于横断数据检验因果关系的研究只能满足共变性，受认可度较高的追踪研究也只是能满足共变性和时间顺序。本研究在满足共变性的基础上，通过对测量时间的控制，能够满足时间顺序这一标准，也尽可能地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释，获得的因果关系是较有信服力的。不过，为保证严谨，我们对相关结论的描述进行了修改，尤其是考虑到结论本身可能会造成误读和误用，我们在摘要、结论等关键部分淡化了对因果关系的描述。例如将“导致”“引起”这样的词改为“伴随”等；避免使用“可以”、“能够”这些可能被误解为有导向性的词语，而只客观地描述攻击前后的情绪变化情况。



---

## 第五轮

### 主编终审：

请作者认真在讨论部分对这一轮审稿中的 4 条建设性意见作出回应。

### 审稿人 4 意见：

作者在审稿意见反馈和本轮修改稿中，回应了此前所提出的审稿意见与建议，并做出调整，对此表示感谢。关于目前的稿件，仍存在以下几处可能的困扰，供参考：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再次反馈和建设性意见。本次修改用红色斜体字突出。

**意见 1：**在对审稿意见的回复中，作者论证了“从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角度，本研究的被试是典型的暴力攻击个体”。但尚存的困惑是：用在监的、平均刑期 19 年的重罪暴力犯，来代表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攻击人群”（其中包括存在暴力攻击行为但未获刑、或未获重刑、以及获重刑者），是否可能存在样本代表性方面的偏差？考虑到中国的在押犯仅占据成年人口的很小比例（尤其与美国相比），则关于用在押罪犯的研究结果来推论社会中更广泛的“暴力攻击个体”的情况，就更容易引起忧虑。

回应：暴力犯在整个社会中的代表性的确有限，但它具有更典型和突出的攻击行为，在与攻击行为有关的研究中是具有较好代表性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在具有更典型攻击行为的人群中验证和进一步发展“情绪调节理论”。不过如审稿专家所言，如果做过多的推论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忧虑，因此最新稿中，我们在摘要、结论等涉及本研究结论的关键内容中与标题保持了一致，均强调结果是在“暴力犯”中得出的。同时在讨论部分我们也再次强调了选择暴力犯的原因和重要性，以突出研究意义（详见回应 2）。

**意见 2：**考虑到研究报告的标题《情绪如何引发暴力犯的攻击？》，这一标题是否提示，本研究所描绘的，是针对暴力犯（或暴力攻击群体）的特异性结论？也就是说，暴力犯独特地展现出本研究所揭示的那些特征，即：“实施反应性攻击之后，会伴随着正性情绪的提升和负性情绪的下降，实施主动性攻击之后，个体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都会提升”。对于此特异性结论，尚须同时呈现两方面的证据，即：（1）此研究中的被试群体是如此表现的；（2）而对照群体则不是如此表现的。否则，在研究逻辑上，可能面临的困惑是：当前观察到的结果，究竟是更广泛群体的共同特征，还是由该样本代表的暴力攻击群体的特征，抑或仅是在监狱呆了一些年的暴力重罪犯的特征？反过来，如果作者并不希望描述一个针对暴力攻击群体的特异性的结论，那似乎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本研究要以暴力犯作为研究对象？

回应：本文的初衷是为了在一个更能代表攻击行为的样本中研究攻击行为的相关问题，弥补以往只在大学生等正常人群中开展研究的不足（Chester et al., 2019）。本文在暴力犯群体中检验了“情绪调节理论”，研究结果发现，结果总体上符合情绪调节理论，验证了该理论的有效性。但与以往以正常人群的研究相比，也存在着一些特有的结果。在原稿中我们已经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在最新修改稿的 4.2 部分针对研究 2 结果的讨论中，我们又加强了这方面的讨论以突出暴力犯群体和正常群体在情绪调节理论方面的共同点和独特性。

**意见 3：**研究 1 的一项重要结论是：“处于负性情绪状态的个体会将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都当作调节情绪的手段”。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作者采用中介模型描述了负性情绪通过情绪调节动机导致攻击行为的路径，并考察攻击类型对上述路径的调节效应，发现“攻击类型对上述过程不存在调节作用”。这里的困扰是：由于负性情绪和攻击方式这两个变量存在

高度的相关，因此考察后者对前者效应的调节，这一做法本身并不严谨。具体来说，个体的负性情绪明显可能来源于个体先前的挫败与被挑衅经验（在描述统计表中，主动攻击组和反应攻击组在负性情绪上的差异是十分显著的）；而另一方面，个体到底属于主动攻击还是反应攻击，仍然是由其先前的挫败和被挑衅经验来确定的。简言之，在线性模型中，将一个和前因变量存在高度共线性的变量，设置为调节变量加以考察，这个做法是不够妥当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这一建议。本研究中，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的相关为 0.38，这只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相关。另外，我们也检查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让前测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共同预测后测负性情绪，容差值为 0.858（远大于 0.1），VIF=1.165（远小于 10），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简言之，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之间的相关存在，但只是中等程度。如审稿专家所言，尽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理想的调节变量应该与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关都不大（温忠麟等，2005）。本研究的这一方法确存一定的不妥之处，因此在讨论部分我们提出了这一不足。

**意见 4：**对于研究 2 图 3 所描述的结果，作者发现了攻击前后与攻击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这里的困惑是：考虑到主动攻击和反应攻击条件下的被试本身处在不同的负性情绪体验中（主动攻击组的负性情绪较弱，反应攻击组的负性情绪较强），那么图 3 的结果有没有可能仅仅是一种“向均数回归”的效应，而与攻击本身并无关系？设想一个额外的解释：攻击或攻击类型根本不影响个体的负性情绪。只不过，遭遇过挫败的“反应性攻击组”被试，在前测时自然地具有较强的负性情绪；获胜的“主动攻击组”则自然地在前测中具有较弱的负性情绪。而在后测中，两组被试都自然地产生了负性情绪向均数的回归——表现为反应性攻击组的负性情绪减弱，而主动攻击组的负性情绪略微上升（恰如图 3 的描绘）。作者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排除上述额外解释。

**回应：**十分感谢审稿专家的这一意见。的确，如果负性情绪的变化只是“向均数回归”，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将站不住脚。幸运的是，本研究的数据结果应该可以较好地排除这一假设，具体来说：3.2.2 中，我们不仅对攻击前后两组被试的负性情绪变化做了检验，还在控制了前测负性情绪的前提下检验了攻击大小对后测负性情绪的回归系数。如果情绪的变化仅仅是“向均数回归”而与攻击无关，那么攻击大小便不会对后测负性情绪有预测作用。但结果显示，后测情绪的变化是与攻击大小存在正或负相关的，在前测负性情绪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果能够较好地说明负性情绪的变化不是（至少不仅是）“向均数回归”，而确与攻击行为有关。我们在讨论部分再次强调了对这一部分统计内容的描述，以突出我们对排除这一额外解释所作的工作并消除潜在的误解。详见 3.1.2 最后，3.2.2 第二段和 4.2 开头等部分。